

来远日记爆北洋海军真面目

该舰额定202人实有180人,4名值更官笔迹一样,还漏记重大事件

本报记者 高洪超

只过去了116年,但甲午国耻留给我们可资股鉴的实物并不多,所谓研究、所谓成果多在少数原始档案和一大堆后人著述的文字中打转,因此才会出现例如方伯谦被杀之事沉渣泛起,研究权威又无力应对的诡异。

2010年12月中旬,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《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》稿影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准实证角度检视甲午国耻的机会。这个稿影本由燕京图书馆沈津教授发美国,收件人是威海威东航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建军——执著于甲午历史真相研究的一介布衣。

透过《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》的字里行间,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被倚为“国之干城”的北洋海军的些许原色。

从1888年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,到1895年2月17日全军覆没前,定、镇、经、来、致、靖、济、平等八大“远”构成舰队主要战力。仅“八大远”日记至少就有1500本,但随甲午国耻而来的50年外侵、内战,这些原始史料散失殆尽。

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有一些中国原版典籍,该馆沈津教授为此出版了一本《中国珍稀善本古籍书录》,《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》名列其中。这本日志如何到了哈佛大学图书馆,个中曲折不得而知,但沈津下了如此结论——“尚存此一‘管驾日记’外,它舰均无

实物留存。”

作为一个甲午专门史研究的非职业学者,孙建军曾发表过诸如“为广乙舰管带林国祥正名”的系列文章,半路入门,后发其轫,在圈内颇有名气。沈津看过他的几篇文章后,于2010年12月中旬告诉他燕京图书馆藏有一本《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》。孙建军请他拍摄,沈津老先生欣然同意,并表示,“这个东西只有到了真正的学者手上,才会发挥其价值”,全部拍摄很快发来。

甲午国耻发生在威海116年后,北洋海军舰船日志第一次出现在国人视野中。

额定202人实有180人 疑是吃空饷

《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》内页是中国传统的红格、竖排、右起书写、右翻线装本,现代军舰、古代书式合二为一,恍如时空交错。封面红纸书签有正楷毛笔字“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”字样,扉页则是红色楷体印刷字“北洋海军兵船管驾日记”。

第3、4页是来远舰“履历”,包括这艘军舰的铺设龙骨、下水日期以及载重、吃水、锅炉动力、枪炮配备、舢板、定员等数据。此后全是常规日记部分,一天两页,数据包括值更官、点钟(值更时间)、风向、船向、天色、经纬度、直方向、记事等24项。对治史者来说,最重要的正是所谓的“记事”。

整本日记时间跨度从光绪二十年(1894)阴历五月初一至五月廿九。记录显示,来远舰整月都停在威海基地,此时离阴历六月廿三丰岛海战爆发不到30天。因此,从这

本日记的寥寥记载,可以看到当时的东北亚时局动向和北洋海军自身备战的些许端倪。

手写毛笔字“履历”显示,1894年5月,来远全舰各岗实有180人,而前页却载明“额定202人”,差额22人。孙建军认为,这可能是舰长邱宝仁在吃空饷。

180人中,依据品级高低,有资格在这本日记中出现名字的只有22人,最高首长管带邱宝仁,有一大堆头衔——“升用总兵,北洋海军右翼左营副将,喀勒崇依巴图鲁”。邱宝仁以下,依次是帮带大副林文彬、鱼雷大副张哲滢、驾驶二副唐春桂、枪炮二副谢葆璋、船械三副千总邱文勋、舢板三副署理千总蔡馨书等22人,职位最低的是三等医官陈崇基,只是从九品。除此,木匠头目、水手等只能以“N名”黑字出现,即使本岗仅一人。

朝鲜局势危急 来远日记有记录

1894年阴历五月初一日,威海全天气晴朗,风一级。当天上午,来远舰“照常工作”,只在上午9点演练了一次“操洋枪御敌”。下午,除“工作”,出现了一次情况——“二点十分,济远、扬威开”。五月初四下午又记“七点十五分,超勇开。四十五分,操江到”。

上述信息都是“来远”舰值更官的观察、记录,寥寥数语,见证了当时的朝鲜局势,而济远、扬威、超勇相继离威,更是有来头的。



来远日记“履历”右页,表明“额定二百二员”。



来远日记“履历”左页,有四个值更官的详细信息,累加诸员人数,仅为180人。



五月初二日记载明,谢葆璋当日必须值更8小时,若是真正执行起来,还真是不轻松。



来远管带邱宝仁。



威海威东航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建军。

值更官的观察、记录,寥寥数语,见证了当时的朝鲜局势,而济远、扬威、超勇相继离威,更是有来头的。

1894年春夏之交,朝鲜民众武装反抗政府残暴统治,爆发东学党起义,官军镇压不力,朝王转请清廷派兵做帮凶。李鸿章根据时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提供的情报,决策于五月初一出兵。他电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、扬威赴仁川、汉城护商,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、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派准军1500人,坐招商轮船,先后进发。

当天,丁汝昌以济远、扬威为分遣队先发,次日下午到达仁川。聂部则于五月初三在大沽乘“图南”运输船出发,“超勇”舰则于初四自威海基地出发,中途会合“图南”,一路护航,初五抵达牙山。

运输舰“操江”到威也是有原因的。因济远、扬威驻仁川,超勇驻牙山,相互通讯不畅,丁汝昌才请调“操江”赴牙山担当通报舰。实际上,操江舰于五月初五离威,而这一天来远日记“记事”栏只有“停工”,对操江当日出发未作记录。

袁世凯重器私用 送四个小老婆离朝

大清驻朝全权大臣袁世凯对局势判断失误,跌入日军圈套,援兵入朝,给了日军依据《天津条约》同样派兵入朝的充分理由。身处前线,狡猾的袁世凯知道战争不可避免,企图脱身事外。不顾局势紧张,他竟动用自己大清国海陆援朝部队“全营翼长”的权力,动用当时在朝火力最强的近海防御铁甲舰平远号,把自己在朝鲜娶的四房姨太太连同大批财物送回国内。

这件事,最早由为济远管带方伯谦鸣冤的匿名书《冤海述闻》公之于世,但记录时间出现了错误。

《冤》书记载“十八日……七点半钟,我北平煤船到,平远、扬威两船上煤。十九日下午,驻韩袁观察眷属上平远船。三点钟,镇远、超勇、广丙到仁川,倭兵船大岛踵至。二十日下午,平远船由仁川开送文报并袁观察眷属往烟台”。

而五月十九日、二十二日、二十三日的来远日记则证明《冤》书弄错了这个细节的时间。

五月十九日“记事”:下午“三点二十分,平远到,五点,平远开”。二十二日下午“记事”:“十二点半,平远到”。二十三日“记事”:“一点半,平远开”。

依据来远日记这三天“记事”,再结合镇远管带林泰曾归威后上报的“林泰曾覆命书”,我们可以知道,“平远”舰应是十八日载送袁世凯眷属离开朝鲜,十九日驶抵威海,停留1小时40分,交付文件后,立即离港送袁世凯的家属、私产到烟台,二十二日又回到威海,次日下午一点半再度离港返朝。

117年后的今天,我们仍可从平远舰的紧张行程感觉到朝鲜局势之危,而如此国之重器,在国运危关之时,竟被挪用办私事。

四名值更官笔迹一样 还漏记重大事件

按照1888年版《北洋海军章程》规定,海军各船值更官,应将天气、风色、水势及行泊时刻、操演次数、机舱内轮机迟速,日用煤、油料若干,并有无事故,凡有关操防巨细事务概行登记。由管带官随时稽察,如有错漏,小事记过一次,大事记过二次,或酌量惩办,而且要上报海军提督。

也就是说,来远舰值更官须亲自值更观察,也必须亲自填写日记。但仔细检视通卷《来远兵船日志》,笔迹竟出自一人,这完全悖于值更官须亲自揭管“概行登记”的规定。日记载明,当月四个值更官分别是驾驶二副唐春桂、枪炮二副谢葆璋、船械三副邱文勋、舢板三副蔡馨书。

正是北洋海军管理混乱、纪律松懈的力证。

其实,军舰值更还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以五月初二为例,谢葆璋当日必须值更8小时,分别是在凌晨5时到上午8时59分,另一班是在当晚9时到0时59分,若真正执行起来,相当不轻松。而实际上,来远舰四个值更官每天必有2人值两更。如此辛苦值更,又出现了通篇一样的笔迹,让人浮想联翩。

除笔迹问题,通览来远日记,“记事”简略,甚至漏记重大事件。如五月初五全天仅记“停工”两字。五月二十九日记“上午,照常工作,九点半利运到”,“下午,工作”,实际上,这一天的日记漏掉了一个重大事件,即镇远、济远、平远、超勇自朝鲜回到威海基地。4艘主力舰执行重大任务归航,而且是来自于朝野瞩目的朝鲜半岛,来远舰日志竟然无只字片言。

笔迹可疑,漏记重大事件,一本《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驾日记》露出了当年被倚为“国之干城”的北洋海军的原色。

对此,孙建军认为应是舰上文案或书办代为填写的,也可能是抄送李鸿章或海军衙门的备案本。若是原本,就说明明瞭“外瞭四远”并认真记录的唐春桂、谢葆璋等人都在玩忽职守,一艘之长邱宝仁也是漫不经心,因为他有“随时稽察”的职责。如此,